

何新经典精解系列

大政宪典

——尚书精解

何新 著

 哈尔滨出版社

何新经典精解系列

大政宪典

——尚书精解

何新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政宪典/何新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12

(何新经典精解系列)

ISBN7 - 80699 - 591 - 9

I. 大... II. 何... III. 尚书 - 研究

IV. K221.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913 号

责任编辑: 颜楠 肖新明

装帧设计: 肖新明

大政宪典

何新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 - 82159787

E-mail: hrbcbbs@yeah.net

网址: www.hrbcb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699 - 591 - 9/K · 63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 - 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题记

本书原稿著作于八十年代中期,是我读经时所作的札记。九十年代间有补充及修正。

《周书·洪范》以下,虽也早已成稿,但尚有些问题。因此暂未收入,拟待本书再版时另予补入。特此向读者说明。

新石器时代

伏羲·陶唐氏	(约 1 万年—4 千年前)		
文化区域	早期	中期	晚期
黄河上游		仰韶文化	半山马厂文化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
黄河中游	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有虞氏 (玉石文化)			
长江下游		青莲岗文化	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
长江中游		屈家岭文化	龙山文化
北方草原	细石器文化·红山文化		
	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长江下游印纹陶文化		

注:在商、周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长江下游的印纹陶文化,仍属于新石器时代。

夏(约公元前 21—前 16 世纪)·世系

(约 B. 2000)禹 - 启 - 太康 ^①
- 仲康 - 相 - 少康 - 杼 - 槐 - 芒
- 泄 - 不降 - 扃(不降弟) - 廑 - 孔甲(不降子) - 皋
- 发 - 履癸(桀)(约 B. 1528 ± 10)
(竹书: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 471 年) ^②

①《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据考 B. 1953, 2 月中旬至三日初,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五星通列,角距小于 4 度。

则禹之年代应在 B. 1953 $\pm$ 50 年代。距今 4100—4200 年。《御览》82 引《竹书》: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 471 年。《路史》后纪卷注引《汲冢纪年》:并穷寒计 472 年。

②《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魏太史丞许艺称:周纪 867 年,夏纪 400 余年。绍兴本《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商(公元前 16—前 11 世纪)·世系^①

(B. 1528?)
汤 - 外丙 - 仲壬
- 太甲 - 沃丁 - 太康 - 小甲
- 雍己
- 太戊 - 仲丁
- 外壬
- 河亶甲
祖乙 - 祖辛 - 沃甲 - 祖丁 - 南庚 - 阳甲
——盘庚 - 小辛
- 小乙 - 武丁
- 祖庚
- 祖甲 - 廩辛
康丁 - 武乙 - 文丁 - 帝乙 - 帝辛(纣)

①关于殷商纪年,史传多有异说。明嘉绪年《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新唐书·历志》引一行定古历,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八年。”《易纬稽览图》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同,约略可信。

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前 771 年)·世系^①

	周武王发 ^②	(周政 2 年即位)
	周公 7 年	(B. 1042—B. 1036)
	周成王诵 ^③	28 年(B. 1035—B. 1008)
	周康王钊	26 年(B. 1008—B. 983)
	周昭王瑕	19 年(B. 982—B. 964)
	周穆王满	28 年(B. 964—B. 937)
(B. 936—B. 922)	周恭王瓘	45 年,懿王元年灭
(B. 922—B. 900)	周懿王歆 ^④	23 年,再旦, B. 899
(B. 899—B. 987)	周孝王辟方	11 年
(B. 888—B. 872)	周夷王燮	17 年
(B. 871—B. 828)	周厉王胡	44 年
B. 841 庚申	周共和	元年

①据魏太史丞许芝说,周纪八百六十七年。

②文王受命 8 年武王即位,11 年伐殷,12 年克纣,建周朝,14 年崩。

③据赵光贤推算武克商之年在 前 1045 年。(武王十一年)。

④李学勤说 B. 899 年 4 月 21 日“天再旦”当懿王元年。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何新经典精解·总序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一)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二)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苐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来乃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

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 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三)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① 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论《尚书》

1

《尚书》是我国古代政治文献中一部最古老的著作,包括公元前五千年到两千年前间的许多政事记录和诰誓文令。其文献来源于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国家政典档案。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孔丛子·论书第二》)

中国之成文史,以《尚书》记录为最始,因此其价值极其重要而珍贵。

先周时代,《尚书》本藏于王室宗社,包括所谓“三坟(藩/谱)、五典(政)、八索(绳)、九丘(州)。”(《左传·昭公十二年》)先周之诸邦各国皆有本邦国的王室档案,即所谓“春秋”、“梲机”(何按:梲机是鳄鱼古名。以鳄鱼皮为图经,即传说中之“龙图”)、“乘”(即“册”之转语),是皆为各国之“尚书”。

春秋之际,战乱频仍,王室凌夷颠覆,周之王政亦不存,典籍档案失散。于是孔子将其收集整理,重新编辑,将一部分来自周王室所存的中央政治档案编为《尚书》,将鲁之王室档案编为《春秋》,用以传授子弟。^①

《汉书·艺文志》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至于尧,下记于秦。”故《尚书》之古本,与《春秋》、《诗经》一样,都是孔子给予系统编纂的。^②

2

“尚书”名称的由来,旧说以为即“上书”,“上古之书”。孔颖达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也。故曰《尚书》。”然此言实甚谬。

若准此,那么难道《易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诗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

① 《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② 《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愚意以为,《尚书》者,即太尚(宗社)所藏华夏先祖之史传政典文献也。尚,古堂字。太堂,即“太尚”,亦即明堂太室,是上古国家宗社之所在。^①因先王政典存录于此,故尚堂之书乃称“尚书”,即“太尚之书”,亦即国家宗社所藏之史典。^②此至简、至明一义,而两千年间治《尚书》者,竟皆不得而明之。

值得注意的是,至秦汉时代,宫廷公文书,皆仍称“尚书”。敦煌武威汉简有“尚书臣”之称。汉制有“尚书令”之官职,与太史令、太乐令均隶属于“太常”。^③直到秦汉,仍以所谓“尚书”作为中央政治文件档案处之专称。秦汉法古制,下臣上奏皇帝之书称“上书”,皇家档案收藏之官文书则称“尚书”。此乃“尚书”之又一意义。

《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可知古代本有记帝王古语及诏策一体裁,而《尚书》正是记录上古帝王“古语及诏策也。”

先秦著作引用《尚书》,多仅称为《书》。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战国时总称为《书》。亦或称为《先王之书》。唯《墨子·明鬼》篇首见《尚书》一名,曰:“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④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尚书》之名称。

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和《春秋》被列为查禁之重点。但宫中档案则仍存(即“中秘藏书”)。秦末人民起义反秦战争中,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秦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皆焚之于一炬。

吕后时代汉惠帝除禁书令,民间收藏之《尚书》复出。

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济南伏生(名胜,山东邹平人)公开传授《尚书》。司马迁记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

① 明堂太室,夏商周称“太社”,秦汉称“太常”或“太尚”。亦为九卿职官之名,主司典章制度、宗庙祭祀、礼乐及选才考试。

② 太尚藏书,不仅政典。《墨子》书中以“诗书”连言。《墨子·非命》:“夏商王诗书”,以诗书连言。“明鬼”引《诗·大雅》“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称之为“周书·大雅”。

③ 汉称“太常”,秦称“奉常”。《史记·三王世家》:“三月乙亥……尚书令奏未央宫。”《汉书·张安世传》云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

④ 清代王念孙说,此句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为夏书,其次为商书、周书。”何案其说谬。此断句当如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或“故《尚书》,夏书、商、周之书。”

又,我颇疑《逸周书》原也属于《尚书》,是《周书》之逸篇。

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倪宽……”（《史记·儒林传》班固《汉书·儒林传》同）。

《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当系伏生后学传本。其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后世称《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共王刘余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间发现孔氏后人藏书。^①

到汉武帝时代，又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传本。并出现了以汉隶（“今文”）与先秦文字（“古文”）书写的两大系统不同传本。都陆续被收入中秘，列于学官，亦为民间学者所传习。

汉武帝年间，司马迁著《史记》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传》）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故。“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西晋遭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②《尚书》亦再度亡散。

东晋政权南迁后，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颐（蹟）采录收集到的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献上朝廷。此即《尚书》的今日传本（梅氏传本）。^③梅颐所献《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又附《尚书孔氏传》十三卷。其经文四十六卷，与壁古文相近，然内容殊异，实乃西晋学者收集当时传《古文尚书》经文暨《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家周书》等），撰辑而成。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大致相同：“刘余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几十篇，皆古字也。”按西汉末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② 《经典释文·叙录》。

③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颐奏上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

关于梅颐，《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云：“《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

蒋善国曰：“梅颐，据明袁氏嘉趣堂（刊）《世说新语》作梅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枚颐，《音义》作梅颐。朱骏声说：‘古人名颐字真。晋梅颐字仲真，作梅蹟者误。’”

但自《尚书正义》误作梅蹟以来，清代学者多知梅蹟，而不知梅颐。又云：梅颐传《古文尚书》和献《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传授，是没有根据的。由郑冲把《古文尚书》传到梅颐，都在永嘉乱前，当时不但《古文尚书》传于民间，就是三家《今文尚书》，汉、魏《石经》，马、郑《书经》，都是极平常书。

4

《尚书》体例,有典、谟及誓、诰、命五种。(如“虞夏书”有“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夏启伐益,有“甘誓”。)

典谟盟誓的时代,乃是华夏政治国家组织开始形成的滥觞时代。

“典”即政典,“谟”即谋议。“誓”,即盟誓约誓,是由自然法、神判法向刑法及刑罚演进的前身。誓有强制之义。誓体之演变,就是后世皇帝之“制”。蔡邕《独断》:“制书者,制度之命也”,亦即法令。这些文体一直传沿到秦汉以下。

“诰”是言教,是帝王的演讲、言告之词。秦始皇改诰为“诏”,诏者,教也,诫也。命者,名也,故封授曰“命”,策封王侯曰“命”。孔子之所谓正“名”,要正的就是这种代表等级与身份的“命”。

《荀子·大略》云:“诰誓不(言)及五帝。”誓、诰、命三种政治文体的形成,都在夏、商、周之际,标志着由神权国家走向政治制度化。

今传《尚书》各篇题下皆有短序。班固说:孔子“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准此,则书“序”是由孔子所作。

传者,即训,指口传。“尚书”佚于秦火及秦末兵乱。今所见传世本的原型,都已并非原始文献,而是汉初朝廷向民间儒师征集记述之所得。但是,无论确有遗籍,或来之于口耳之传,或来之于汉晋间儒者纂辑之故典传说(难免有窜乱或附会己意),《尚书》中收录的材料都是具有深远来历的。虽未必全出之于三代旧典,但无一不有所渊源。

其实《尚书》就是远古历史。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古事传说;二是历史文献。司马迁著作《史记》时,充分使用了《尚书》中的史料。

汉初儒家以《尚书》为政治教科书。西汉初年两位最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和晁错,都是治《尚书》之学出身。

对此书汉武帝亦曾有所评论。元狩三年,武帝与倪宽论学,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汉书·儒林传》)自武帝重视此书,《尚书》对汉唐以下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

5

《尚书》所录文献表明,自夏商以来,中国已是文明灿烂,政教严整,法规明确,具有成熟、系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和礼仪制度。

孔子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范本,用以教授生徒。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始终被置于至尊的地位。以故,《尚书》实际是儒家的大宪之典。

《尧典》所谓：“克明俊德(身)，以亲九族(家)。”九族既睦(族)，平章百姓(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即由身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由国而天下，正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化人伦政治理想。

一部《尚书》，可以认为乃是儒家政治理想最完整和最系统化的体现。因此，自汉代以后，《尚书》既是历代帝王所必须研习的基础政治教科书，又是从政的士大夫必读必遵的经宪大法。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作为中国5000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组核心价值。

贯穿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多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元年》)虢国史嚣语

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

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并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以民为本的政德的理念，就蕴涵在《尚书》的亲民与正德之理念中。后来荀子概括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6

伊尹、周公是商周政治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者。华夏政治文化的两位最初传道者。

周公用“以德配天”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论”。

他第一次把天的好恶与地上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一方面承认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人格神，“我亦不敢宁

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尚书·周书·君奭》)，“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诗·闵予小子之什·敬之》)

另一方面强调“敬德保民”可以感动上天，使天命得以长保。周公是用“敬德”改造了早期宗教的天命论。德者，循也。循即规范。规范植规，即私德。私德来自于修养，即修德。天之规范曰道。人群之规范曰循。个人之规范曰德。

“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以贯之。”^①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周公旦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穡之难，闻小人之劳”。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②

7

以现代政治学眼光观，所谓德就是社会契约。天德就是自然法。

这些思想，在崇信暴力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时代被抛弃。但秦亡后，汉初政治家总结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发现必须予以重申和重视。故以治《尚书》出身的贾谊论安国之道为九个字，云：

“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

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以

① 《观堂集林·周制度论》。

② 《尚书·无逸》。《荀子·王》

上俱引自贾诩《新书·大政》)

关于刑杀(暴力)与德治之关系,董仲舒则提出:“德主刑辅”“天之任德不任刑”,“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国古典时代的帝王政治,原则上奉行君轻民重的治国原则。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能天下奉一人”即此义也。除秦皇、隋炀、朱温等少数被称为“独夫民贼”的暴君以外;中国帝王政治非常不同于中西亚及罗马的暴君专制政治,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就因为奉行了《尚书》所总结的治国治民原则。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理论,西方近代首先由孟德斯鸠所表述,但在先秦儒家理论中已经萌芽。

荀子论“五道”(即治国之道)——提出了礼、乐、刑、政的“四达”。这“四达”中,礼即制度,相当于立法权。刑即司法权,政即行政权。乐(“乐文”)不仅指音乐,美学。“乐以宣情”,指的是控制人心、情感的意识形态。荀子说引《乐记》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以别贵贱,乐文以沟通人心。

荀子政治思想,是儒家与法家的综合。儒以礼乐为本,而法以法制为具。其根源,皆来自《尚书》。

8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中国远古之政治中已总结出如此成熟的一套政治理念。此比之20世纪流行的权力迷信,以为有权即有一切,靠暴力、镇压可以维持统治(如林彪云:“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权而可以为所欲为云云,前商周的这一套德治观念,更复杂也更成熟,更具深厚的历史感。

中国远古政治历史中之所以能形成数千年一系相承的华夏帝统,出现周汉唐宋明清这样数百年统一文明稳定的伟大帝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百折不磨慎终追远而宏扬光大至今,显示出发达成熟高度的政治智慧,其政治奥秘也在于此。

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以《尚书》之纠纷为最多。历史上围绕《尚书》的文体及经义解释,围绕其来源出处(所谓“真伪”)及传承问题,曾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学术论争和辩论。其中影响至大的即是汉代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以及宋、明、清以来关于其书“真伪”及“疑古”之争。

这种学术论争,都不单纯是学派或学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实际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围绕实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论争的表层语言现象背后,贯穿着为主导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发生的重大竞争。